

宋代《礼记》学文献综论

潘 斌

摘要：宋代的《礼记》学受到宋代学风的影响甚深，疑经疑传的特点很明显。宋代《礼记》学文献的数量很大，分为论说类和考据义理并重类两大类型，广泛分布于经、史、子、集、丛各部。宋代《礼记》学文献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宋代；礼记；礼记学文献

中图分类号：K8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8)06-0017-04

宋代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高峰时期，宋学以其与汉学迥异的治学路数，对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代经学乃宋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宋儒对《易》学、《诗》学和《春秋》学十分关注，而于宋代理学建构起重要作用的《礼记》之学却不甚重视。宋代《礼记》学批判并继承了汉唐时期的笺注之学，同时又启元明清重视义理的《礼记》研究路数，学术价值自不待言。本文侧重于从文献的角度对宋代《礼记》学作一考察，以期抛砖引玉，便于学人们深化对宋代《礼记》学的研究。

一、宋代《礼记》学文献的宋学特征

汉学《礼记》研究尊重《礼记》文本原貌，不随意删改经文，多宗郑注，采用注不破经、疏不驳注的原则对经加以阐释。而宋代的《礼记》研究则倡导以义理解经，怀疑《礼记》经文和注疏，并对《礼记》篇目进行更改。

首先，宋儒重视以义理解《礼记》。皮锡瑞认为宋代为经学的“变古时代”^①，这个时期，经学领域的最大特点就是汉唐笺注之学的没落，同时，以义理解经成为一时的学术风尚。笔者认为，宋儒以

义理解《礼记》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礼义的层面，即寻求礼的仪节制度背后的意义；二是哲学的层面，即以《礼记》为文本依托，阐发哲学思想。礼义层面的，如有刘敞的《七经小传》之《礼记》部分、张载的《礼记说》、方悫的《礼记解》、陆佃的《礼记解》、叶梦得的《礼记解》等；哲学层面的，如有朱熹的《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吕大临的《中庸解》以及袁甫的《蒙斋中庸讲义》等。

其次，宋儒治《礼记》时多疑经文和旧注。王应麟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宗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埂。”^②北宋初中期的怀疑之风深深地影响到《礼记》学的发展，刘敞《七经小传》中的《礼记》部分、李觏的《读儒行》、王安石的《礼记发明》、陆佃的《礼记解》、方悫的《礼记解》等文献，不仅怀疑经文，还于郑《注》和孔氏《正义》多有异义。

再次，宋儒治《礼记》时还对经书文本进行改动。汉唐诸儒治《礼记》均尊重《礼记》文本原貌，而鲜有人对《礼记》文本进行改动。宋儒则反此道而行之，北宋时期，先有程子改动《大学》、《中庸》在前，南宋又有朱熹等人改动《大学》、《中庸》在后。此外，南宋卫湜撰《礼记集说》，分各家之说于《礼记》经文之下，以众家之说代替郑、孔之见。南宋宗朱学者黄震《黄氏日抄·读礼记》和魏了翁《礼记要义》也于《礼记》文本多有分合。

二、宋代《礼记》学文献的数量

①[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0页。

收稿日期：2007-2-13

基金项目：本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儒家文献学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号：05JJD72009）

作者简介：潘斌（1979-），四川大学古籍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经学史。

②[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朱彝尊《经义考》著录的宋代《礼记》学文献大约有 270 余种,其中单篇之属约有 200 种。单篇文献中,《中庸》文献约有 70 种,《大学》文献约有 40 种,《大学》和《中庸》合论文献约有 30 种。王锬先生《三礼研究论著提要》著录的宋代《礼记》学文献为 124 种,其中不包括宋代《大学》和《中庸》文献。《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在《经义考》的基础上有如下增补:陈襄的《礼记讲义》、周行己《礼记讲义》、沈焕《礼记订义》、朱熹《礼记章句》和《大小戴礼论》、徐自明《礼记说》、亡名氏《礼记举要图》。

笔者从专著、专论和序跋入手对宋代的《礼记》学文献进行了统计。宋代《礼记》学专著是指:(1)宏观研究《礼记》的著述,包括注、解、论、说、讲义、传等;(2)独立成篇,单独刊行,或学界习惯上单言其名,或比较著名的目录书予以著录者。以此为著录标准,宋代《礼记》学专著约 110 种,分别为 93 位学者所作。其中流传至今的有 14 种,亡佚和存佚不明 96 种。宋代《礼记》学专论文献是指:未单独刊行,寓于学者各自的文集之中而又单独成篇,从微观上研治《礼记》学文献的有关文献,不包括寓于《四书》学中的有关《大学》和《中庸》文献。以此为辑录标准,宋代专论类《礼记》学文献 81 种,涉及学者 26 位。序跋类,包括“序”和“跋”,也包括“后记”。奏议包括“奏”、“进”、“表”、“劄子”等。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宋代《礼记》学文献的撰写雕版等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予以收录。宋代《礼记》学文献序跋类、奏议类文献共 27 种,涉及学者 20 位。

三、宋代《礼记》学文献的主要类型

考虑到学人们对宋代的《礼记》学进行研究时更多的是涉及专著和专论类,所以有必要对宋代专著专论类《礼记》学文献作进一步的分析。宋代专著类《礼记》学文献的内容与形式多样。从内容上讲有考察名物的,有研究礼制的,有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有阐发义理的;形式上有传、注、疏、图等。考虑到宋代《礼记》学文献内容与形式的实际情况,笔者将宋代专著专论《礼记》学文献分为论说类、训诂义理并重类两大类型,此划分均是从文献诠释方式的角度入手的。

宋代“论说类”《礼记》学文献又可分为两个小的组成部分:一是经学家或理学家在其专门的《礼记》学文献中借助《礼记》文本阐发自己的思想,而非对《礼记》文本中的文字、名物礼制进行考证。如张载在其《礼记说》中通过对《礼记》的训释从

而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不但涉及中庸、礼乐等多方面课题,而且还涉及太虚即气论、格物论、天理人欲、民吾同胞等切要至论。又如王安石在其《礼记发明》中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二是一些学者的文集或笔记中有关于《礼记》不成体系的论述,或以《礼记》中的经文作为阐发自己思想的依托,或对《礼记》各篇的作者成书情况进行说明。如李觏《盱江集》于《礼记》中的《曲礼》、《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礼运》、《礼器》、《内则》、《玉藻》、《学记》、《乐记》、《祭法》、《经解》、《哀公问》、《中庸》、《儒行》、《乡饮酒义》、《丧服四制》等篇的内容都有所援引,以此建立自己的礼学体系。又如《朱子语类》中既有关于《礼记》单篇作者的论说,同时也有关于《礼记》与《仪礼》关系的认识。

所谓宋代“考据义理并重类”《礼记》学文献,是相对于“论说类”《礼记》学文献来界定的。“论说类”《礼记》学文献重视义理的阐发,而“考据义理并重类”《礼记》学文献不但重视义理,同时也重视考据。“考据义理并重类”《礼记》学文献又可以分为两小类:一是一些宋儒在解《礼记》时考据义理并重。如朱熹倡导义理决不能脱离语言文字而独立存在,他说:“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①朱熹在《礼记》学方面的著作,如《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是理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但也下了不少考据工夫。自朱熹重视义理不废考据之后,吕祖谦等人也均是在阐发《礼记》义理的同时,重视对其名物礼制进行考证。二是一些集解形式的《礼记》学文献于汉唐诸儒之说和宋儒解义均有援引。如卫湜的《礼记集说》于汉唐和宋代的《礼记》多家解义进行援引,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汉宋兼采。又如黄震的《黄氏日抄·读礼记》援引不少文字音义方面的材料,同时还引用不少考证礼制的内容,由此可见黄震对考据之学的重视。黄震还十分重视朱熹解义,又反映出他对义理之学的看重。因此,《黄氏日抄·读礼记》是一部考据与义理兼重的《礼记》学著述。

四、宋代《礼记》学文献的分布

1. 经部的宋代《礼记》学文献

唐代以后重要的《礼记》学文献大多通过丛书的形式流传下来。《四库全书》“经部礼类”收录的宋代《礼记》学文献有卫湜的《礼记集说》,单篇类有张虞的《月令解》、袁甫的《蒙斋中庸讲义》、金履祥的《大学疏义》等。此外,《四库全书》经部所

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收的一些经学论著关于《礼记》的文献,如刘敞《七经小传》中有关于《礼记》的解义 31 则,郑樵《六经奥旨》第 6 卷也是关于郑氏对《礼记》的训释内容,毛居正《六经正误》第 6 卷也是专门训释《礼记》的。《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礼类”收录了魏了翁的《礼记要义》。一些经学文献丛书中也保留一些宋代的《礼记》学文献,如徐乾学刻《通志堂经解》采辑宋、元、明以来儒者说经之书 140 种,其中包括宋代《礼记》学文献数种,分别是卫湜的《礼记集说》、赵顺孙的《大学纂疏》和《中庸纂疏》、真德秀的《大学集编》和《中庸集编》等。

2. 史部的宋代《礼记》学文献

在中国传统图书分类中,目录类属于史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都有不少关于宋代《礼记》学文献的提要,这些提要是我们研究宋代《礼记》学文献必须参考的资料。清人朱彝尊的《经义考》是一部经学文献目录,其书卷 141 和卷 142 对宋代《礼记》学文献进行了著录。《经义考》尽可能地提供历代《礼记》学文献的内容、作者、版本和存佚状况,并保存有部分序跋材料,是人们治《礼记》珍贵的参考资料。又如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卷 1 上著录了吕大临《芸阁礼记解》,并有关于《芸阁礼记解》的提要;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著录了吕大临的《芸阁礼记解》、方慤的《礼记解》、马希孟的《礼记解》等,并有关于这些文献的解題。这些关于宋代《礼记》学文献解題也属于宋代《礼记》学文献的范畴。

3. 子部的宋代《礼记》学文献

《礼记》学文献也有不少分布在子部。如《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收有朱熹所编《二程遗书》和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这两部书包括二程和朱熹对《礼记》一书的想法,以及对《礼记》部分内容的诠释。《二程遗书》卷 19 记载了程颐怀疑《儒行》和《经解》的看法。《朱子语类》卷 87 有朱子专论《礼记》的内容,并对多篇内容有诠释。《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收录的宋代《礼记》学文献还有吕祖谦《少仪外传》和王晫《曾子》等。

4. 集部的宋代《礼记》学文献

《礼记》学文献也有分布于集部的。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的《全宋文》中就有收有不少《礼记》学文献。书启方面,如陈傅良《答丁子齐书》专论《曾子问》,朱熹《答赵恭父》中论《祭义》、《内则》等;颂赞方面,如晁迥《大顺颂》论《礼运》等;论说方面,如范浚《月令论》、周行之《经解》、杨简《孔

子闲居解》、朱熹《乐记动静说》、李觏《读儒行》等;序跋方面,如周行之《礼记讲义序》、周諝《礼记解自序》、魏了翁《卫正叔礼记集说序》等;奏议方面,如张虞《进月令解表》、文彦博《奏赐儒行中庸篇并七条事》等。

5. 单刻本流传的《礼记》学文献

除了丛书中收录的宋代《礼记》学文献以外,还有不少宋代《礼记》学文献有单刻本或后人的翻刻本流传至今。这些单刻本《礼记》学文献还可能有好几个版本。这些刻本多保存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里,如魏了翁的《礼记要义》,除了被《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续编》、《宛委别藏》、《五经要义》等丛书收录以外,还有多个单刻本,如宋淳祐十二年魏克愚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清光绪丙戌江苏书局景刊宋抄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清江苏书局校刊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又如卫湜的《礼记集说》,除了被《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和《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收录以外,同时也有单刻本,如明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影宋抄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广东书局刊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高丽刻本(《书目答问二种》)等。

6. 藏书题跋中的宋代《礼记》学文献

一些藏书题跋中有关于宋代某些《礼记》学文献的版本、流传状况的介绍,这也是我们认识宋代《礼记》学文献重要的参考资料。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中就有关于卫湜《礼记集说》版本流传的介绍。又如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有关于张虞《月令解》的题跋。

五、宋代《礼记》学文献的学术价值

宋代《礼记》学文献的学术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代《礼记》学文献是宋代经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易》学、《尚书》学、《诗经》学和《春秋》学都很发达,著作也很多。宋儒也多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而礼学则是关乎伦理纲常的学术,所以宋儒对《三礼》也比较重视,并多有对《三礼》进行研究的论著。根据笔者初步统计,在宋代的《三礼》学文献中,尚可见的《周礼》学文献有 106 种,《仪礼》学文献为 66 种,《礼记》学文献多达 270 种。可见宋代《三礼》学之盛,而《礼记》之学尤为突出。《礼记》中不但有关于礼制的记载,同时还多阐发礼义,这既满足了宋儒建构自己礼学体系的需要,同时其思想性强的特征也满足了宋儒

喜谈义理的学术取向。因此，对《礼记》的训解之作层出不穷。宋代《礼记》学文献不但是宋代《三礼》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宋代经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宋代《礼记》学文献在《礼记》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汉唐时期重视笺注之学，中唐以后学风开始转变，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经学研究取向开始被疑经疑传的风气所取代。在这种风气的转变中，《礼记》文本及其注疏常常被宋儒怀疑。此外，宋儒以《礼记》为文本依据阐发礼义，也有人以《大学》和《中庸》为依托阐发哲学思想。宋儒关于《大学》和《中庸》的研究文献是宋代《礼记》学史上的亮点，值得深入探讨。宋儒治《礼记》考据和义理并重的特点影响深远，观元、明、清时期的《礼记》学的发展，均与宋代的《礼记》学相关。元代经学效法宋代，元代的《礼记》学受宋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朱学，二是改易《礼记》。明代经学效法元代，其《礼记》学著述数量不少，但是少有突破，还是停留在宋代《礼记》研究路数的水平上。宋代《礼记》学对清儒治《礼记》颇有影响，如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100卷体例完全是仿照宋代卫湜《礼记集说》，惠栋《九经古义》、王引之《经义述闻》等经学著作中关于《礼记》的考释均多受宋儒的启发。

第三、宋代的《礼记》学文献对于清理《礼记》经文和注疏，标举典范和恢复《礼记》的生命力有着特殊的意义。《礼记》乃先秦到汉代的礼学资

料的汇编，其中难免有讹脱的地方。自汉代郑玄为《礼记》作注以后，汉唐诸儒多株守郑注，而少有突破。郑玄虽精于《礼》学，但是也不乏疏漏之处。宋儒张扬理性精神，对经书文本以及前人注疏进行重新审视，他们对《礼记》各篇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或经文中的讹、脱、衍、倒、错乱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敞《礼记小传》对《礼记》中的经文和郑《注》的提出了不少异义。由于刘敞的意见并非完全臆说，所以对于认识《礼记》经文旧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代不少学者在研究《礼记》时，于刘敞的《礼记小传》中的内容也多加重视。张载的《礼记说》中疑经改经的地方也不在少数，这些意见虽然出自不以考据见长的张载，但是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

第四、宋代的一些《礼记》学文献在辑佚方面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如果说汉唐时期已经亡佚的《礼记》学文献能在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和杜佑的《通典》等著作中找到一些本已散佚的文字，那么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则保留了很多已经散佚的宋人的《礼记》学文献。卫湜《礼记集说》成为宋代《礼记》学文献辑佚的渊薮，今人陈俊民先生从中辑出了吕大临的《礼记解》，收入《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一书中。笔者也从卫湜的《礼记集说》中辑出了王安石的《礼记发明》、陆佃的《礼记解》、方慤的《礼记解》、张载的《礼记说》等著作。通过这些辑佚之作，我们对宋代《礼记》学文献的认识会更加深入和全面。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Liji Documents of Song Dynasty

PAN Bin

(Ancient Book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Liji learning of Song Dynasty was influenced by the style of study of Song Dynasty. The doubtful tendency is very obvious. The amount of the Liji Documents of Song Dynasty is very big, which has two types: theory and textual research. The Liji Documents of Song Dynasty is distributed in Jing Shi Zi and Ji works. The Liji Documents of Song Dynasty has precious value of Documents and important value of learning.

Key words: Song Dynasty; Liji; the Liji Documents

(责任编辑: 刘兵)